

国家审计与城市创业活跃度

罗春华, 杨 勇, 韦典龙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会计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18)

[摘要]基于国家审计信息理论和免疫系统理论,以中国 278 个城市 2009—2018 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分析国家审计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家审计监督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该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分析发现,国家审计作为一项外部监督机制,能够改善地区政务、市场、金融和司法环境,进而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进一步,国家审计的治理效应在东部地区、规模较小城市以及高政府创新偏好的样本中更明显。研究结论印证了高质量审计监督能够有效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切实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进而优化城市创业环境、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

[关键词]国家审计;免疫系统;经济监督;城市创业活跃度;创业环境;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创政策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3114(2023)06-0010-11

一、引言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载体,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举措。《2021 年中国企业成长报告》指出,我国能够在抵御新冠疫情肆虐的同时保持经济正向增长,离不开新创业发展的巨大贡献。城市不仅是人口、产业和要素资源的聚集地,更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具有极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创业活跃度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它能够在推动经济创新、增加就业机会、促进产业升级和市场效率提升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为经济的可持续、稳定和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支撑。然而,我国不同城市间创业活跃度差异显著,且差距还在逐年扩大^[1],这严重阻碍了区域协调发展与国家共同富裕战略目标的实现。由此,引发我们思考:我国城市间创业活跃度为何呈现出巨大差异?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因素又有哪些?探索上述问题的解决方案不仅有助于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进一步激发市场和社会创造力,更有助于缩小城市间发展差距,推进共同富裕。

梳理关于创业活跃度影响因素的文献可以发现,创业活跃度主要与创业者特质和地区特征等因素相关。就创业者特质而言,创业者融资能力、机会识别能力和创新能力都会显著影响其创业意愿^[2-3]。此外,学者还发现增强创业者创业信心,提高其创业能力是提升地方创业活跃度的关键所在^[4-5]。地区特征方面,杜运周等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发现,创业活跃度受到政务、市场、金融及司法环境等因素的直接影响^[2]。贺建风等的研究表明腐败会抑制创业活跃度,但这种作用效果会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上升而逐渐减弱^[6]。曾雅晶等发现,数字金融发展能够创造良好的投融资环境,提升创业者金融资源获取和配置能力,从而降低市场准入门槛^[7]。提高创业活跃度离不开良好创业生态系统的支持,而创业环境是构建和发展这一生态系统的基础^[2]。良好的创业环境能够吸引和孵化更多的创新企业和创业者,促进资源的集聚和交流,形成良性循环的创业生态系统。相反,恶劣的创业环境可能增加创业的门槛和

[收稿日期]2023-04-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1BJL030)

[作者简介]罗春华(1972—),女,湖南邵阳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与实务、企业与政府数字化转型,邮箱 chluo@hdu.edu.cn;杨勇(1999—),男,江苏常州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审计理论与实务;韦典龙(1997—),男,广西南宁人,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与政府数字化转型。

成本,限制创业者的发展空间,阻碍创业活跃度提高。故研究提升创业活跃度的关键就在于如何进一步优化地方创业环境。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各行各业要营造有利于新创企业成长的良好环境,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三大功能促进国家重大决策部署落实并维护国家经济安全。2014年,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加强审计工作的意见》,要求审计机关担负起追踪重大政策贯彻落实的责任。双创政策作为保障地区发展、释放经济活力的重大政策,自然也是国家审计监督治理的重要对象。目前,关于国家审计监督治理经济后果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治理效应和地区治理效应方面。就企业治理而言,国家审计监督能够协同社会监督,通过缓解信息不对称约束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对国有企业创新、抑制超额商誉和防范金融风险产生显著影响^[8-9]。而从地区治理来看,国家审计监督能够发挥监督激励、缓解信息不对称和风险防范作用^[10-12],进而优化地方政务、金融、市场和司法环境。一方面,国家审计监督有利于保障社会经济秩序有效运行,如抑制政府滥用权力和防范化解地方隐性债务风险等^[10,13-14];另一方面,国家审计亦能在提升政府治理效率、保护环境、维护金融安全及提高地方全要素生产率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12,15-17]。现有研究已对国家审计监督的有效性以及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但鲜有文献将国家审计与城市创业活跃度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因此本文旨在探究国家审计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并从创业环境视角研究其作用机制。

有鉴于此,本文将选取2009—2018年中国城市样本数据,探究国家审计监督治理对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丰富国家审计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之间的研究。目前鲜有文献从国家治理的视角出发,将国家审计与城市创业活跃度纳入统一分析框架,探讨国家审计对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途径及作用机理。第二,提供国家审计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的经验证据。本文将分析国家审计提升创业活跃度的动机、能力以及作用机理,这对进一步理解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具有积极意义。第三,为促进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提出相关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国家审计有动机优化地区创业环境。一方面,国家审计机关首先是政治机关,国家审计的政治性要求国家审计遵循党的领导,自觉在思想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主动提高自身政治站位,落实党中央对审计工作的部署要求^[18]。当前,我国经济已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升创业活跃度是当下国家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部署的重要经济战略。故国家审计理应切实担负起职责,充分发挥“预防、揭示”和“抵御”功能,从而提高创业环境质量,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国家审计作为国家发挥治理效能的重要力量,具有政策性。2018年国务院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印发了《关于推动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打造“双创”升级版的意见》,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充分认识创新创业高质量发展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采取相应举措,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然也不例外。因此,兼具政治性和政策性的国家审计有动机采取措施来优化地区创业环境。

国家审计有能力优化地区创业环境,进而增强当地创业者创业动机和能力,提升创业活跃度。现有文献指出,市场进入壁垒、交易成本和融资约束过高以及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不足是制约创业者投身创业活动的主要问题^[2]。而发挥国家审计的“揭示”、“预防”和“抵御”三大功能则能有效缓解上述问题。

首先,国家审计具有独立、客观和专业等特点,能够有效提高政府透明度和责任性,确保政府的支持城市创业活跃度方面的行动合法合规^[10]。国家审计通过揭露功能及时向社会公众揭示政府运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缓解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审计结果的公开可以减少腐败和滥用职权风险,促进政府更加负责任地推动城市创业发展。此外,国家审计还能够通过“揭示”功能及时反映政府资源在创业政策方面的配置情况,这有助于评估和总结各项政策措施对于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实际效果,并

发现资源利用不当或失职行为,进而为政府提供决策依据,帮助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措施来优化城市创业环境,提高创业者的积极性和成功率。从上述分析可知,国家审计有利于加强政府的透明度和责任性、评估政府资源配置情况以及优化政策措施与规划,从而为创业者提供更加有利的政务环境。进一步,良好的政务环境有利于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审批及违规收费,为新创企业节约不必要的时间成本和人力物消耗成本,进而增强潜在创业者的创业动机,并进一步释放实体企业的发展与市场的活力^[2]。

其次,国家审计具有经济监督、鉴证和评价三大职能。发挥经济监督和鉴证职能,国家审计能够及时揭示市场中潜藏的不规范和失信行为,为政府采取必要的监管和调控措施提供依据。通过降低市场的不确定性和规范经济秩序,国家审计可以提高企业家和创业者的信心,推动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增长。而发挥经济评价职能,国家审计又能够对市场绩效做出合理评价,进而激活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潜力^[11],加快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市场化程度高的地区能够优化配置社会资源。一方面,高质量的市场环境可以吸引更多的风险投资者和投资机构进入市场,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和资源配套,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合作伙伴。另一方面,高质量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形成健全的创业生态系统,例如有效的创新和科技支持体系、投资和融资机构、专业服务提供者等,这些都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网络,从而推动城市的创业活动蓬勃发展^[1]。

再次,国家审计机关是履行国家金融审计和维护国家金融安全的中坚力量。一方面,国家审计通过揭露和查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有效减少腐败现象的发生,提高国家金融安全水平。另一方面,国家审计在听取金融企业和监管部门意见的基础上,结合金融审计结果进行分析评估。通过审计事例和具体数据的分析,可以评估我国当前金融监管体制的健全性和科学性,并发现其中存在的体制性和制度性缺陷。这一过程有助于防范由于监管不足引发的金融风险,并推动进一步完善金融环境^[12]。进一步,良好的金融环境可以提供充足的资金支持和融资渠道,为创业者提供所需的启动资金和发展资金,促进创业活动开展。创业过程中,创业者通常需要大量的资金用于产品研发、市场推广、设备购置等方面。一个有利的金融环境能够提供多样化的融资方式,帮助创业者获得所需的资金支持^[19]。

最后,国家审计还具有重大政策追踪落实的新职能。近年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已将“知识产权强国”写入《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以营造良好的知识产权制度环境,进而激励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国家审计通过对知识产权制度建设实施动态监督,能够尽早揭示和反映妨碍政策顺利执行的困难和问题,督促及时整改,促进政策完善,推进政策执行,即国家审计监督治理有利于优化知识产权司法保护环境。进一步,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能够给创业者带来创新激励。当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较强时,创业者更有信心将自己的创新想法付诸实践。与此同时,知识产权保护还能促进技术转移和合作。良好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有利于促进创业者分享技术和经验,这有助于促进创新和合作,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20]。

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 国家审计监督治理能够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完整性,本文基于2009—2018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进行研究,共计2335条观测值,数据来源于各省区市统计公报及《中国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从各省区市统计局、国家统计局手工整理,其中城市创新创业指数来源于北京大学开放研究数据平台,西藏、新疆因部分数据缺失而剔除,最终获得包含278个城市的样本数据。为控制数据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进行上下1%的缩尾处理。对数据的预处理、分析检验均通过运用STATA17.0完成。

(二) 变量测量

1. 被解释变量

城市创业活跃度($Uact$)为被解释变量。本文采用赵涛等学者所使用的城市每万人新注册企业^[21]对城市创业活跃度进行衡量;在稳健性检验部分,本文则借鉴赵晓阳和衣长军的研究^[3],采用各地级市创新创业指数对城市创业活跃度进行替代性测试。

2. 核心解释变量

国家审计($Gadt$)是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对于国家审计监督治理效能的测量,本文借鉴韩峰等的研究^[22],从国家审计的“揭示”、“预防”和“防御”三大功能衡量国家审计的治理效能。“揭示”功能从两方面衡量:一是审计机关完成审计项目数量的自然对数,二是审计机关查出问题金额的对数。“预防”功能采用审计机关移送司法、纪检监察机关处理事项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衡量。“抵御”功能从三个方面衡量:一是审计机关出具审计报告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二是审计机关提出审计建议和提交审计信息数量加1的自然对数,三是审计机关处理处罚金额的自然对数。在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处理后,运用熵权法进行权重计算。通过求取指标比重获得指标熵值,求出指标冗余度,计算权重结果,最终得到揭示、“预防”和“抵御”职能三个维度的特征权重,分别为0.33、0.16与0.51,并按照各自的解释百分比加权构造出国家审计指标($Gadt$)。

现阶段,用国家审计指标衡量重大政策跟踪审计并进行实证检验具有可行性与可靠性,原因如下:(1)受限于国家审计数据与项目披露条件。从国家审计披露渠道看,《中国审计年鉴》公布的审计数据没有细分审计类型,而审计机关官方网站公开的“审计结果公告”也并不全面,审计数据缺乏完整性与持续性。(2)与实际情况的偏差较小。在审计工作实务中,地方审计机关将与重大政策跟踪审计有关的监督统筹纳入了各种日常性、持续性的审计业务类型中。因此,国家审计指标虽然不能逐一精准对应重大政策跟踪审计,但总体偏差不大,研究结论具有可靠性。

3. 中介变量

(1) 政务环境($Ggov$)。本文采用有为政府作为代理变量。借鉴姬卿伟等的研究^[23],考虑政府在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贸易政策、循环经济、社会保障方面的重视程度及成效,建立多维评价指标体系,以分析地方政府的管理质量及水平,并采用熵权法计算有为政府指标权重。(2) 金融环境($Frate$)。考虑到城市规模的影响,本文借鉴茹乐峰等的研究^[24],用金融机构存贷总额/年末市区总人口进行衡量。(3) 市场环境(Mkt)。本文基于樊纲市场化指标,结合各地级市的相关数据测算市场化指数,用市场化指数表征有效市场。(4) 司法环境(Lkn)。借鉴龙小宁等的研究^[25],使用每年地方政府发布的知识产权制度数量与年末市区总人口之比作为衡量指标。具体数据来源于北大法宝数据库,检索标准如下:实施日期为“2008—2017年”,法规类别为“知识产权”,时效性为“现行有效”,效力级别为“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地方规范性文件、地方工作文件”。这些战略规划、法规、规章是各地区知识产权保护在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维度的依据,故数量越多说明地方政府在立法制规上对知识产权保护越为重视。

3. 控制变量

为了控制其他因素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本文选取经济发展水平($Mgdp$)、城镇化水平(Urb)、外商实际投资水平($Foreign$)、环境污染水平($Lns02$)、人力资本水平(Hum)作为相应的控制变量,具体变量及计算方式如表1所示。为保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同时还控制了年度固定效应和地区固定效应。

(三) 模型设计

为检验假设H,本文构建如下模型:

$$Uact_{i,t} = \alpha_0 + \alpha_1 Gadt_{i,t} + \alpha_2 Contorls_{i,t} + \m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1)$$

模型(1)中, i 代表不同的城市个体, t 代表年份, $Uact_{i,t}$ 为被解释变量城市创业活跃度, $Gadt_{i,t}$ 为核心解释变量即国家审计指标。 $Contorls_{i,t}$ 代表一系列控制变量(μ_i 表示控制了城市固定效应, δ_i 则表示控制时

间固定效应), $\varepsilon_{i,t}$ 表示随机扰动项。若 α_1 显著为正,表示国家审计正向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则假设 H 成立。

四、实证分析

(一) 描述性统计

表 2 展示了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城市创业活跃度($Uact$) 均值与最值相差大,说明我国不同城市间创业水平具有充分变异性,这为计量分析提供了良好基础。国家审计($Gadt$) 指标后最小值为 0.003,最大值为 0.786,其最值之间相差较大,说明我国不同地区的国家审计监督治理效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同样,中介变量和控制变量在均值和最值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充分说明我国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存在。控制变量结果与已有文献^[1,26] 并无较大差异,本文不再赘述。

(二) 回归分析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列(1)中仅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国家审计($Gadt$),列(2)加入控制变量,列(3)进一步控制年度和城市效应以控制不随时间和地区变化的影响因素,回归结果均在 1% 水平上显著,说明国家审计能够释放城市创业活力,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假设 H 得到支持。此外,由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来看,所有控制变量均显著,进一步说明控制变量选取合理。

(三) 稳健性检验

1. 更换 LSDV 模型

由于固定效应模型中个体效应与解释变量相关,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将不能获得参数的无偏估计量,因此本文借鉴王彦东等的做法^[26],更换 LSDV 模型进行回归,表 4 列(1)回归的结果显示依然稳健。

2. 替换解释变量

对于国家审计指标的衡量,本文借鉴张鼎祖等的研究^[27],基于国家审计的“预防”“揭示”“防御”三大功能的发挥,采用 CRITIC 法计算国家审计($Gadtn$)的治理效应。相关回归结果如表 4 的列(2)所示。更换解释变量后,回归结果显著为正,表明结果仍然稳健。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借鉴赵晓阳和衣长军的研究^[3],采用地级市创新创业指数对城市创业活跃度进行测量。为了剔除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类型	变量名	变量代码	变量定义
被解释变量	城市创业活跃度	$Uact$	城市每万人新注册企业
核心解释变量	国家审计	$Gadt$	根据熵权法计算所得
	政务环境	$Ggov$	根据熵权法计算所得
	市场环境	Mkt	结合地级市数据测算市场化指数
中介变量	金融环境	$Frate$	金融机构存贷总额/年末市区总人口
	司法环境	Lkn	知识产权制度数量/年末总人口
	经济发展水平	$Mgdp$	地区人均生产总值自然对数
控制变量	人力资本水平	Hum	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
	城镇化水平	Urb	市辖区人口/城市总人口
	环境污染水平	$Lns02$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的自然对数
	外商实际投资水平	$Foreign$	实际使用外资金额/地区生产总值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N	$Mean$	SD	Min	$p50$	Max
$Uact$	2335	86.440	87.310	1.310	67.770	1502
$Gadt$	2335	0.242	0.243	0.003	0.192	0.786
$Ggov$	2335	0.058	0.031	0.022	0.049	0.181
Mkt	2335	10.420	2.240	3.743	10.410	16.970
$Frate$	2335	10.690	12.730	1.204	6.108	73.020
Lkt	2335	0.239	0.770	0	0.025	12.620
$Mgdp$	2335	10.480	0.601	8.935	10.460	11.940
Hum	2335	1.695	2.018	0.004	0.956	12.760
Urb	2335	0.340	0.226	0.062	0.281	1
$Lns02$	2335	10.480	0.962	7.568	10.610	12.300
$Foreign$	2335	0.020	0.018	0.001	0.014	0.084

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1) $Uact$	(2) $Uact$	(3) $Uact$
$Gadt$	95.730*** (23.92)	44.583*** (9.30)	28.213*** (4.03)
$_{-}cons$	63.063*** (14.40)	-147.835*** (-3.52)	225.317*** (2.83)
$Controls$	No	Yes	Yes
$City$	No	No	Yes
$Year$	No	No	Yes
N	2335	2335	2335
Adj. R^2	0.215	0.361	0.396

注:表中括号内报告的是稳健标准误,***、**和*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 1%、5%和 10% 置信水平下通过显著性检验,下同。

规模效应,本文采用各城市创新创业总量得分除以总人数和城市面积得到城市创业活跃度人均得分($Uact$ 1)和单位面积得分($Uact$ 2)。相关回归结果如表4中的列(3)和列(4)所示。由表4可知国家审计对城市创业活跃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与基本回归结果保持一致。

4. 子样本回归

考虑到国务院在2015年颁布“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这一事件,为避免政策倾斜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测度,本文缩小样本期间,选取2015年以前的样本代入模型进行检验。表4列(5)表明研究结论仍然稳健。

(四) 内生性检验

1. 进一步控制遗漏变量

为了缓解因遗漏变量引起的内生性问题,借鉴郭檬楠等的研究^[8],本文首先进一步控制其他固定效应,包括控制省份固定效应、省份与年份交互效应,以减缓外在宏观因素对不同城市国家审计监督治理效能的影响。其次,本文在模型中加入政府干预($Gint$)和政府支持($Gsup$)作为控制变量。其中政府干预用财政支出在地方GDP中的比重来衡量,政府支持用政府科教支出在地方GDP的比重来衡量。表5的列(1)和列(2)分别报告了进一步控制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的结果,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2. 工具变量法

考虑到国家审计与城市创业活跃度之间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关系以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借鉴蔡利和段康的研究^[13],以地方审计机关人员编制数的自然对数(Amt)作为国家审计监督治理($Gadt$)的工具变量,并滞后一期处理,以探究国家审计监督的动态效应。从外生性角度来看,根据《国务院关于地方各级审计机关设置和人员编制问题的通知》,地方审计机关岗位与职员数量应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设置和聘任,岗位与职员数量的设置主要基于地方人口总数。例如,通知要求一百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审计局,可比照省级审计局的编制配备。在职人员数占比与审计工作范围和项目规划相适应,而与地方经济状况、城市创业活跃无必然相关性;从相关性角度来看,地方审计机关的人员越多,表明国家审计可供投入的审计力量越大,审计效能发挥得越好。回归结果显示,表5中列(3)显示工具变量与国家审计质量存在显著正相关性,列(4)显示第二阶段中国家审计的系数5%的水平上显著,与基准估计结果一致。

3. 倾向匹配得分

本文在样本选择时可能存在选择性偏误问题,因此选择PSM进行修正。借鉴郭檬楠等的研究^[28],选择国家审计质量均值以上的地区作为实验组,其他地区作为控制组,选择模型(1)中的全部控制变量作为匹配变量,采用Logit模型计算倾向得分,采用1:1的最近邻匹配得到最终对照组样本。表5中的列(5)报告了回归检验结果,仍然稳健。

4. $t+1$ 期因变量

本文采用 $t+1$ 期城市创业活跃度($L.Uact$)替换($Uact$)代入模型(1)进行检验,表5列(6)结果显示国家审计($Gadt$)显著为正,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说明在消除因果倒置产生的内生性问题后,本文的结论依然成立。

表4 稳健性检验

	(1) $Uact$	(2) $Uact$	(3) $Uact1$	(4) $Uact2$	(5) $Uact$
$Gadt$	28.213 *** (3.52)		2.572 ** (2.08)	1.503 ** (2.47)	19.041 ** (2.19)
$Gadtn$		9.220 * (1.90)			
$-cons$	183.220 * (1.73)	201.177 ** (2.52)	-34.899 ** (-2.48)	-22.293 *** (-3.21)	83.369 (0.81)
Controls	Yes	Yes	Yes	Yes	Yes
City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N	2335	2335	2335	2335	1690
Adj. R^2	0.800	0.308	-0.098	-0.054	0.078

表5 内生性检验

	(1) <i>Uact</i>	(2) <i>Uact</i>	(3) <i>Uact</i>	(4) <i>Uact</i>	(5) <i>Uact</i>	(6) <i>Uact</i>
<i>Gadt</i>	26.976 *** (3.30)	17.570 ** (2.53)		66.331 ** (2.18)		20.475 *** (2.64)
<i>Gint</i>		-51.229 (-1.31)				
<i>Gsup</i>		0.000 *** (8.93)				
<i>Amt</i>			0.217 *** (5.57)			
<i>_Treated</i>					43.443 *** (11.97)	
<i>_cons</i>	460.837 *** (4.13)	267.326 *** (3.33)			70.310 *** (31.78)	195.173 ** (1.99)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Province</i>	Yes	No	No	No	No	No
<i>Province * Year</i>	Yes	No	No	No	No	No
<i>Cit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2311	2335	1972	1972	2335	1978
<i>Adj. R²</i>	0.808	0.338	0.236	0.236	0.057	0.123

五、进一步研究

(一) 作用机制检验

前文在理论分析中提到国家审计的治理效能够通过优化政务、市场、金融以及司法环境进而推动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因此,本文拟从政务环境、市场环境、金融环境以及司法环境四个方面探求国家审计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关系。

本文借鉴温忠麟等的中介机制检验^[29],使用逐步回归法对国家审计影响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理进行检验。根据逐步检验法构建了以下模型:

$$New_{i,t} = \gamma_0 + \gamma_1 Gadt_{i,t} + \gamma_2 Contorls_{i,t} + \m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2)$$

$$Mediators_{i,t} = \gamma_3 + \gamma_4 Gadt_{i,t} + \gamma_5 controls_{i,t} + \m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3)$$

$$New_{i,t} = \gamma_6 + \gamma_7 Gadt_{i,t} + \gamma_8 Mediators_{i,t} + Controls_{i,t} + \mu_i + \delta_i + \varepsilon_{i,t} \quad (4)$$

1. 政务环境

一方面,审计结果的公开有利于减少腐败滋生和政府滥用职权的风险,缓解公众与政府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国家审计通过揭示政府的支持城市创业活跃度方面的资源分配情况,有助于评估各项政策对于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实际效果,帮助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政策,提高创业者的积极性和成功率。进一步,良好的政务环境又要求政府努力优化行政审批程序,提升审批效率,这不仅能节约创业者的资金和时间成本,帮助其及时把握商业机会,而且可以减少政府对市场的无效干预,提高新创企业的资源可获得性,增强潜在创业者的市场进入动机,推动城市创业活跃度提升^[26]。表7列(1)报告了国家审计与政务环境的回归结果,国家审计回归系数在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可继续检验。列(2)显示,政务环境(*Ggov*)和国家审计(*Gadt*)都在1%水平显著为正,证明国家审计能够通过优化政务环境来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

2. 市场环境

减少政府干预是实现市场化发展、优化市场环境的重要途径^[26]。一方面,国家审计“预防”、“揭示”与“抵御”功能的发挥能够有效约束政府、明确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减少政府干预,进而改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国家审计具有经济监督、鉴证和评价职能,及时揭示市场主体运行中存在的规范、不道德现象,有利于为政府采取必要的监管和调控措施提供依据,以推动市场公平。进一步,市场程度高的地区能够帮助投资者避免因市场体制不完善而导致的投资创业风险。同时,良好的市场环境有利于形成健全的创业生态系统。例如,有效的创新和科技支持体系、投资和融资机构、专业服务提供者等都能够为创业者提供必要的资源和支持网络,从而推动城市的创业活动蓬勃发展^[1]。表6列(3)报告了国家审计与市场环境的回归结果,国家审计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可继续检验。而列(4)结果显示,市场环境(*Mkt*)回归系数在5%水平显著为正,国家审计(*Gadt*)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国家审计能够通过优化市场环境,进而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

表6 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机制检验

	(1)	(2)	(3)	(4)	(5)	(6)	(7)	(8)
	<i>Ggov</i>	<i>Uadt</i>	<i>Mkt</i>	<i>Uadt</i>	<i>Frate</i>	<i>Uact</i>	<i>Lkt</i>	<i>Uact</i>
<i>Gadt</i>	0.003 ** (2.25)	26.336 *** (3.79)	0.125 * (1.89)	28.793 *** (4.12)	3.698 *** (4.91)	14.899 ** (2.30)	-0.017 * (-1.88)	28.850 *** (4.13)
<i>Ggov</i>		580.069 *** (5.45)						
<i>Mkt</i>				-4.625 ** (-1.99)				
<i>Frate</i>						3.600 *** (19.03)		
<i>Lkt</i>								36.713 ** (2.20)
<i>_cons</i>	0.156 *** (6.70)	134.842 * (1.70)	7.526 *** (9.92)	260.127 *** (3.19)	43.833 *** (5.11)	67.534 (0.91)	0.259 ** (2.46)	215.806 *** (2.71)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it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2335	2335	2335	2335	2335	2335	2335	2335
<i>Adj. R²</i>	0.396	0.322	0.931	0.313	0.418	0.415	0.174	0.314

3. 金融环境

一方面,国家审计通过揭露和查处金融违法犯罪行为,能够将金融发展的实际状况呈现在阳光下,接受更多部门和公众的监督,增加其违规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审计还能就金融监管中发现的问题深入本质,揭示问题背后可能的体制性、制度性缺陷,并督促问题部门及时整改,以防范由监管不足引发的金融风险,推动金融环境优化完善。进一步,新创企业由于缺乏行业经验与稳定的客户关系,会更依赖于金融服务等外部资源的支持。良好的金融环境下,金融制度尤其是融资制度通常更加规范健全,金融资源能够合理配置,潜在创业者因此更有机会从外部获得资金开展创业活动,创业者融资约束得到缓解,创业动机进一步增强^[3]。表6列(5)报告了国家审计与金融环境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可继续检验。而列(6)结果显示,金融环境(*Frate*)回归系数在1%水平显著为正,国家审计(*Gadt*)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国家审计能够通过优化金融环境,进而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

4. 司法环境

国家审计是加强民主和法治建设的重要工具。国家审计将审计结果公告中存在的违法犯罪线索移送司法机关能够对问题企业产生明显的威慑作用,形成监督合力,提升地区司法效率,强化司法建设;与

此同时,国家审计能够针对现存的体制障碍、制度缺陷和治理漏洞提出建设性整改意见,有利于健全法制,对推进法治国家、法治社会、法治政府建设具有重要意义^[26]。进一步,法治环境的改善能够为创业活动的持续开展提供制度保障,如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有利于鼓励企业通过专利、著作权等方式进行创新,增加研发活动投入,提高创业质量,进而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30];同时,良好的法律制度环境还能有效减少银行对中小微企业的歧视,使新创企业获得商业银行的支持,从而保障新创企业资金良好流通。表6列(7)报告了国家审计与司法环境的回归结果,结果表明,国家审计回归系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说明可继续检验。而由列(8)结果显示,司法环境(*Lkt*)回归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国家审计(*Gadt*)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证明司法环境在国家审计推动创业活跃度中起到了中介作用。

(二) 异质性分析

1. 地理区位

考虑到不同地区由于资源禀赋和社会发展存在区域性差异,国家审计对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作用效果也可能因地理区位不同而存在差异,因此本文根据城市所在区域进行划分,将样本区分为东、中、西部三大地区进行分组回归,以探讨不同地理区位对于国家审计和城市创业活跃度两者的调节作用。

表7展示了区域异质性回归结果。列(1)至列(3)分别为东部、中部与西部地区。由表7列(1)可知,国家审计(*Gadt*)指标显著为正,且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在东部地区,国家审计能够显著推动城市创业活跃度(*Uact*)的提升,而根据列(2)和列(3),国家审计回归系数在中部地区与西部地区均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东部地区相较于中西部地区拥有着更加丰富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更高,数字化建设水平也更高。而数字化建设强化了国家审计监督治理的手段,有利于提升监督治理效果。另一方面,东部地区审计机关建议功能更强,当地政府更有可能采纳国家审计机关提出的建议,故东部地区国家审计对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促进效果更明显。

表7 异质性回归结果

	(1) 东部	(2) 中部	(3) 西部	(4) 省会	(5) 非省会	(6) 政府创新偏好
<i>Gadt</i>	63.548 *** (4.26)	-3.079 (-0.48)	3.011 (0.41)	8.143 (0.51)	28.900 *** (3.88)	-13.659 (-0.65)
<i>Zfct</i>						24.581 (0.53)
<i>c. Gadt#c. Zfct</i>						219.685 ** (2.26)
<i>_cons</i>	385.635 ** (2.37)	-101.938 (-1.25)	247.218 ** (2.46)	-33.846 (-0.13)	239.969 *** (2.91)	325.507 *** (3.27)
<i>Controls</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City</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Year</i>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i>N</i>	970	957	408	235	2100	2335
<i>Adj. R²</i>	0.300	0.418	0.667	0.711	0.283	0.256

2. 城市规模

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需要在人口和资源的自由流动中实现,政府政策供给和区域发展战略需要与国家审计质量相适配,因此需要考虑不同城市规模下国家审计政策的影响效果。本文根据城市是否为省会城市将样本划分为省会与非省会两类。

表7列(4)和列(5)的结果显示,相较于在省会城市中,国家审计(*Gadt*)在非省会城市更能推动地区创业活跃度的提升。考虑到创业活跃度是基于对新进企业数量评价得出的,相较于非省会城市,省会城市的目标可能已经从追求新创企业数量提升到追求新创企业质量上来,故国家审计发展对于城市创业活跃度的促进效果反而不显著。

3. 政府创新偏好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政府具有强烈的创新偏好意味着政府对区域内创新活动的支持程度和资源倾斜。同时,具有创新偏好的政府通常还会向大众提供创业补贴,缓解创业者面临的创业风险。故政府创新偏好更强的城市更有动机提升当地国家审计监督治理效能以助推城市创业活跃度。考虑政府创新偏好的影响,本文借鉴朱锦余等的研究^[31],用地方财政支出中的科学技术支出占比来衡量政府的创新偏好($Zfct$)。表7列(6)展示了政府创新偏好调节国家审计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回归结果。由列(6)可知,国家审计与政府创新偏好的交乘项($c. Gadt\#c. Zfct$)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表明政府创新偏好在国家审计推动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关系中起到了正向调节的作用。

六、结论性评述

本文基于国家治理视角,选取我国2009—2018年的城市层面数据,考察了不同地区国家审计治理水平与城市创业活跃度发展之间存在的潜在关系。研究发现,国家审计监督治理能够显著提升城市创业活跃度,且国家审计主要通过优化政务、市场、金融以及司法环境提高城市创业活跃度。此外,在东部地区、非省会城市和政府创新偏好较高的地区国家审计更能发挥自身治理效能以提高城市创业活跃程度。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1)提升国家审计监督治理效能。通过建立以研究型为导向的审计工作机制,找准研究型审计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强化国家审计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发挥国家审计在国家治理中的巨大作用。(2)注重创业环境优化工作。创业环境的优劣直接关系到创业者的生存和发展机会。在良好的创业环境下,创业者能够更好地获取资源和支持,获得创新创业的信息和技术,降低创业风险,提高成功的概率。因此,国家审计部门要在规范中引导、在建议中激励,为创业环境优化工作不断作出积极贡献。(3)创业政策制定要因地制宜。我国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特征,政策引导应充分考虑各地区的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因素,出台有利于本地区发展的差异化政策。

参考文献:

- [1]叶文平,李新春,陈强远. 流动人口对城市创业活跃度的影响:机制与证据[J]. 经济研究,2018(6):157-170.
- [2]杜运周,刘秋辰,程建青. 什么样的营商环境生态产生城市高创业活跃度?——基于制度组态的分析[J]. 管理世界,2020(9):141-155.
- [3]赵晓阳,衣长军. 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城市创业活跃度吗? [J]. 现代财经(天津财经大学学报),2022(11):19-31.
- [4]李其容,李春莹. 创业市场信心与创业行为关系的动态解析——基于GEM与WBD的混合横截面数据的经验证据[J]. 技术经济,2022(10):79-93.
- [5]Lan S, Xiang G, Wang Q, et al. Public policy environment and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Evidence from China[J]. China & World Economy, 2018, 26(3):88-108.
- [6]贺建风,陈茜儒. 腐败与大众创业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基于金融发展门槛模型的经验证据[J]. 当代经济科学,2018(3):75-85.
- [7]曾雅婷,邢晶晶,李宾. 数字金融发展对新创企业成长的影响——融资约束和研发投入的链式中介效应与异质性分析[J]. 西部论坛,2022(6):20-36.
- [8]郭檬楠,吴秋生,郭金花. 国家审计、社会监督与国有企业创新[J]. 审计研究,2021(2):25-34.
- [9]张俊民,石威峰,毛玥. 国家审计能否抑制超额商誉?——基于央企控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 审计研究,2022(2):19-30.
- [10]王善平,谭雪. 国家审计治理地方政府行政代理问题的机制研究[J]. 会计研究,2021(8):153-160.
- [11]树成琳,宋达. 国家审计效果、政府行为与市场化进程——基于中介效应理论的实证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6):11-18.
- [12]张曾莲,岳菲菲. 国家审计维护金融稳定的路径与机制研究[J]. 金融经济研究,2021(2):34-51.
- [13]蔡利,段康. 政府审计对地方政府债务治理的效应研究[J]. 审计研究,2022(2):31-42.
- [14]Lin X, Chen S, Cheng X, et al. Local government audit and municipal debt risk: Evidence from audit reform in China[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2, 50:103198.

- [15] 贺宝成,熊永超. 国家审计如何影响政府治理效率? ——基于 Tobit-SDM 模型的空间计量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1(6):16-25.
- [16] 李甜甜,许婧,唐凯桃. 国家审计对产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研究[J]. 审计研究,2022(4):3-14.
- [17] Smith F H, Retief F P, Roos C, et al. The evolving role of supreme auditing institutions (SAIs) towards enhancing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Impact Assessment and Project Appraisal, 2020, 39(2):1-13.
- [18] 董大胜. 国家、国家治理与国家审计——基于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中国国情的分析[J]. 审计研究,2018(5):3-11.
- [19] 张卫东,夏蕾. 营商环境对大众创业的影响效应——来自商事制度改革的证据[J]. 改革,2020(9):94-103.
- [20] 姜南,李鹏媛,欧忠辉. 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与区域创业活跃度[J]. 中国软科学,2021(10):171-181.
- [21] 赵涛,张智,梁上坤. 数字经济、创业活跃度与高质量发展——来自中国城市的经验证据[J]. 管理世界,2020(10):65-76.
- [22] 韩峰,胡玉珠,陈祖华. 国家审计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研究——基于地级城市面板数据的空间计量分析[J]. 审计与经济研究,2020(1):29-40.
- [23] 姬卿伟,李跃. 有为政府、多样性经济与城市制造业发展[J]. 城市问题,2015(6):33-40.
- [24] 茹乐峰,苗长虹,王海江. 我国中心城市金融集聚水平与空间格局研究[J]. 经济地理,2014(2):58-66.
- [25] 龙小宁,易巍,林志帆. 知识产权保护的价值有多大? ——来自中国上市公司专利数据的经验证据[J]. 金融研究,2018(8):120-136.
- [26] 王彦东,马一先,乔光华. 国家审计能促进区域营商环境优化吗? ——基于 2008~2016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J]. 审计研究,2021(1):31-39.
- [27] 张鼎祖,申幸杰,孟昕晴. 国家审计对地方财政支出结构的影响研究[J]. 财经理论与实践,2022(3):78-85.
- [28] 郭檬楠,郭金花,杜亚光. 国家审计治理、数字经济赋能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J]. 当代财经,2022(5):137-148.
- [29]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 心理学报,2004(5):614-620.
- [30] 夏绪梅,李翔. 营商环境与城市创新创业质量的协同机制及其关系检验[J]. 统计与决策,2023(7):184-188.
- [31] 朱锦余,李玥莹,龙娟. 国家审计影响区域创新能力吗? ——基于地方政府创新偏好的实证研究[J]. 南京审计大学学报,2022(3):10-19.

[责任编辑:黄燕]

Government Audit and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LUO Chunhua, YANG Yong, WEI Dianlong

(School of Accounting, Hangzhou Dianzi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overnment audit information and immune system theory, panel data of 278 Chinese cities from 2009 to 2018 were selected for empirical analysis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government audit 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government audit supervision and governance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in cities, and this conclusion is still valid after a series of robustness tests.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government audit, as an external supervision mechanism, can improve the regional government, market, financial and judicial environment, and thus enhance th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of cities. Furthermore, the governance effect of government audit is more evident in samples of eastern regions, smaller cities, and high government innovation preference. The conclusion confirms that high quality audit supervision can effectively ensure high-qual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ffectively transform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into governance efficiency, and optimize the urban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and increase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Key Words: government audit; the immune system; economic supervision; urban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economic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mass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policy